

编者按:本期《科海钩沉》栏目配发了由中国科学院大学自然科学史教授、“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荣获者潘云唐撰写的、介绍中国地质学一代大师尹赞勋先生生平事迹的特约稿。该文原是为纪念尹赞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而作,文稿较长,将分两期刊出。尹赞勋(1902-1984)是“中国地质科学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卓越成员”(本文语)、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师,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副所长、代所长。解放后,先后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地质矿产部前身)第一副主任、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副院长兼教务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尹赞勋院士(上)

□ 潘云唐



尹赞勋(1902~1984)

尹赞勋院士是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卓越的大师、重要的学科带头人。

正直进步的青年

尹赞勋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2 月 23 日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平乡县城东北 30 里的大时村一个官宦世家,他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县官。他从小不但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异,而且还随母亲辗转于河北等地父亲的任所,使他眼界大开。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本县高等小学后,考上了著名的保

定府育德中学。1919 年,他 17 岁时,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并波及保定。他虽出身于官宦门第、世家望族,但他从小就很有爱国心、正义感,他奋起投入此运动的洪流,上街游行,并演讲、宣传,还参与编导了时事讽刺剧《巴黎和会》,使他受到很大锻炼,尤其在科学与民主新思潮影响下,确立了“科学救国”的志向。当年秋,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开始了科学事业的征程。

大学与留欧生活

尹赞勋进入北京大学时,校长蔡元培正贯彻他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教育方针,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师生思想活跃,流派纷呈。年轻的尹赞勋受到很深的影响,为了拓展自己的学习领域,他多次改变方向,4 年之内,他读了 4 个科系:预科甲部(理科)、乙部(文科)、本科中文系和哲学系各一年。1923 年 9 月,他提前出国留学,去德

国学习经济学,旅欧途经法国里昂时,遇到若干同乡学友,其中有张玺(后来曾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海洋生物学,特别是贝类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听众学友们的劝告,改而留学法国,并把重点也改为自然科学。他首先是学习法语,不仅课堂上认真听讲,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加强接触,去街头听演说,去中、下层社会与各行各业的法国朋友聊天,而且到各地去旅游。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顺利地过了语言关,并于 1925 年进入里昂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学习,2 年之内,他取得了动物学、自然地理学、地质学 3 张毕业文凭(相当于 3 个学士学位)。1927 年他又一鼓作气在该校继续攻读研究生,重点在地质古生物学,他不但“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他为了从事地质实习、考察、采集标本等走遍了大半个法国(法国 80 多个州,他到过 50 多个),而且还到过邻近的瑞

士、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占了中欧、西欧极大部分,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更多了解。1931年3月,他完成研究生学业,以“法国加尔和埃罗两省齐顿阶动物群之研究”(齐顿阶是法国侏罗系的一个地层单位,其中多含软体动物化石)的毕业论文荣膺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成果水平很高,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大师,如法国的任纽(Gignoux)、英国的阿克爾(Arkell)等都在他们所编撰的总结性世界地质名著中加以引用。他当年研究过的标本,至今仍珍藏在里昂大学陈列馆内,作为后学者教材享用。

尹赞勋留欧期间,不但学术颇有长进,业绩辉煌,而且他也十分关心世界形势,站在公允正直的立场上看问题。他留学的后期,正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他到中欧西欧各国考察地质时,也对工农劳苦大众的境遇相当同情,他还阅读过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对很多问题都有正确的认识。

中国地质科学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卓越成员

1931年5月,尹赞勋载誉归国。应聘到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师。他早期的工作主要是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如他鉴定描述了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的瑞士地质学家海姆(Heim)采自四川峨眉山中三叠统拉丁阶的海相双壳类化石;又去哈尔滨顾乡屯对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野外发掘和

鉴定描述。他这方面较大的成就就是晚古生代软体动物化石的研究,1932~1935年间,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志·乙种》、《中国北部本溪系及太原系之腹足类化石》、《中国北部本溪系及太原系之头足类化石》及《中国古生代后期之菊石化石》等4本著作。在地层时代方面,他最擅长的、贡献最大的则是早古生代志留纪地层,他早年在云南施甸、湖北宜昌、贵州桐梓等地着重详细研究了志留纪地层和化石,发表了很多著作。1949年,他发表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南部志留纪地层之分类与对比》的巨著,所以他获得了“尹志留”的美誉。

尹赞勋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除上述研究重点而外,他的工作还涉及到沉积学、岩石学、矿床学、构造地质学、火山学、岩溶学、天文地质学、水文学、地貌学,等等,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尹赞勋被任命为江西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省会南昌沦陷以后,该所迁往江西泰和,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了将近2年,他在副所长高平建议和协助下,主持编绘了江西省1:20万区域地质图8幅,在抗战初期的动荡环境中,他们完成的图幅在量和质上都居于全国各省之冠。1939年10月,他调任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驻昆明办事处主任。1940年2月又调离昆明去重庆北碚任该所副所长。

那时丁文江和翁文灏原本很欣赏黄汲清的地质科学天才,内定为他们的接班人。1932年送黄到瑞士留学,1935

年,黄荣膺浓霞台大学博士学位,又在欧美各国短期考察后于1936年1月返回上海,知丁文江于半个月前在长沙病逝,悲恸不已。他向翁作了汇报后,翁立即任命黄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地质主任(Chief Geologist,相当于“总工程师”)。1937年初,黄被任命为该所代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写道:“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君汲清代理,此即在君(丁文江的字)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对此事作了很好的说明。黄汲清并没有骄傲自满,得意忘形,恰恰相反,他却十分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当年6月,黄随翁一同去莫斯科,出席第17届世界地质大会。黄在宾馆里与翁交谈时,说他年纪太轻,资质太浅,他当时才是33岁的年轻小伙子,中国地质科学界比他资格老、能力强、成就大者多的是。他向翁建议由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的北京大学高班学长孙云铸或杨钟健来担任所长较合适。翁听后没有表态。他们开完会回国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汲清临危受命,领导了地质调查所的两次大搬迁;当年11月由南京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7月又由长沙迁往重庆,最后落脚于北碚。

1939年,黄汲清见地质调查所到重庆北碚后,规模甫定,已正常开展了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他也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前途作一些考虑,自己35岁,正是精力旺盛的壮年时期,应该在科学研究上有重大建树,为整个一生打下基础,于是产生了摆脱行政事务、潜心钻研学

术的想法。他先在口头上向经济部(实业部 1938 年改称经济部)负责人——部长翁文灏、常务次长潘宜之等透露他这个意向,翁、潘等人却对他恳切挽留。1940 年初,翁要求黄派人去四川涪陵调查铁矿,而地质调查所当时人手很紧张,难得抽出力量,又看到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已经有人在那里做工作了,就没有及时执行翁指派的任务,因此而遭到翁的训斥。经济部矿产司司长李鸣和暗里向黄交了底,原来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办的钢铁公司急需铁矿,把翁文灏催得很紧,所以翁才发脾气。黄汲清一听,原来是国人都唾骂的大财阀孔祥熙让他受了这份窝囊气,于是十分气愤,他向翁文灏、潘宜之正式递上书面辞呈,坚决要辞去所长职务。翁、潘经一阵劝慰,实在不行之后,只得向他征求推荐继任人选的意见。

黄汲清经过仔细斟酌后,提出刚接任副所长的尹赞勋很合适。他认为,尹比他大两岁,又是他北京大学的高班学长,出国留学也比他早,尹 1931 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他却是 1932 年才出国留学的,尹回国近 10 年业绩也很突出。按说,翁是留学法语国家比利时的,尹是留法的,他们应该有较多共同语言。也许是因为尹为人正直、进步,不习惯旧官场的陋习吧!翁却偏偏对尹没有太多好感。翁召见另一位他所喜欢的人,就是黄的北大同班同学李春昱,李 1934 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当大地构造学权威史蒂勒的研究生,1937 年以“最优

等”成绩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应翁文灏之请,创办了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干得也很出色。翁要求李调到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来当所长。李春昱却说,他刚办起了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头绪纷繁,一时难以离开,他向翁表示支持黄对尹的推荐意见,相信尹一定能把这工作担当起来,干得很好。翁文灏、潘宜之在无奈之下,任命尹为代所长。他们既然喜欢黄、李,就应该采纳黄、李的推荐意见,直接就重用尹,他们没这样做,既亏待了尹赞勋,又驳了黄、李的面子,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真是严重失误。

尹赞勋虽然在主持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工作一事上,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以工作为重,尽职尽责地干得很好,他双肩挑起了从事科学研究和业务管理的重担。他本人的科研工作毫不放松,他 1940 年开始着手于古地质方面的研究,他从美国引进了新的地质学理论和制图方法,对中国贵州遵义一带的栖霞海侵前后地层分布进行了周密的调研,绘出该区的古地质图,对阐明该区地质环境的历史演变并寻找矿产资源有很大的益处,深受中国地质学界赞誉。在古生物化石方面,除了他最擅长的软体动物化石而外,也特重视笔石,笔石演化快,地质分布短、地理分布广,是最佳的标准化石,他对滇西、川南、黔北、甘肃的志留系及所产笔石研究最详,成果也最丰。在他主持所里科研管理工作中,他也支持了其他学者的课题项目,如黄汲清领导的四川二叠纪地层的

研究,四川、甘肃等地的石油地质调查研究等,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就在 1940~1941 年,中国“恐龙研究之父”——杨钟健研究完成并出版了关于《许氏禄丰龙》的专著,这是中国人写的研究恐龙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中国的第一副完整安装的恐龙骨架,在北碚公开展出,杨亲自演讲了“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很大轰动。

1940 年,尹赞勋当选担任了中国地质学会第 17 届理事长,他积极领导了学会活动,他与曾任学会第 13、14 届理事长的杨钟健一起创作了“中国地质学会会歌”的歌词:“大哉我中华,东水西山南北土真足夸。泰山五台国基固,震旦水陆已萌芽。古生一代沧桑久,矿岩化石富如沙。降及中生代,构造更增加。生物留迹广,湖泊相屡差。地文远溯第三纪,猿人又放文明花。锤子起处发现到,共同研讨乐无涯。”后经理事会通过,由黄汲清请音乐家黎锦晖谱了曲,就在学会会员,乃至整个中国地质学界传唱开了。1941 年,地质调查所名称加了“中央”二字,叫“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这年适逢建所 25 周年,又是第一任所长丁文江逝世 5 周年,尹赞勋领导与主持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当年 3 月 8 日—10 日,在重庆大学大礼堂举行了中国地质学会第 17 届年会,尹赞勋发表了理事长演说,题为“中国地质工作之新近进展”。会后,3 月 16—18 日在重庆沙坪坝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地质展览会,观众达数万人次。年末,在北

磅还举行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 25 周年纪念大会,由尹赞勋主持,中央政府官员、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领导人均出席,还编印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概况》的纪念专册,规格很高,影响很大。

尹赞勋在为人处世上,始终坚持正直、进步的立场,他任代所长期间,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像他这样的“简任官”都要到重庆浮图关(那时一度改名“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去受训,并要诱迫加入国民党,但他却是同期受训人员中唯一拒不参加国民党者。他确实与旧官场积习格格不入,而且也厌恶上司所为,终于在 1942 年夏上了万言书,其中说:“部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实难应付”,愤而请辞代所长之职。翁文灏也就只得允准他辞职,仍任副所长。翁并迫使李春昱就范,调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并为李保驾护航,亲自到全所大会上宣读李的所长任命书。李春昱到任后,对尹赞勋十分尊重,事事与他商量,和衷共济。这样,尹赞勋与前任所长黄汲清、后任所长李春昱共三任所长同堂共事的经历,一时传为佳话,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都是其中的卓越成员。他们在解放前后数十年间建立了并一直维持着极深厚的友谊。

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要领导者

1948 年底,蒋军一败涂地,人民解放军很快兵临南京城下。反动当局勒令中央地质调

查所等单位迁离南京。李春昱所长召集老地质学家尹赞勋、侯德封、程裕淇、李善邦、高振西、叶连俊等共商该所前途,大家一致主张留下。李一方面贮备粮、油、盐、咸菜等应变物资,一面软缠硬磨,搪塞反动当局,拒不搬迁。在全所大会上,李宣称,愿留下者,短期内吃饭没有问题。尹赞勋则慷慨激昂,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表示绝不再对国民党抱幻想,决不能跟国民党走!后来,绝大多数职工都留在南京,迎接解放。

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连同人员、图书、仪器、标本以及一切财产统统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尹赞勋在人民政权时代,聪明智慧和学术领导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全力以赴为新中国地球科学事业而不懈工作。当年 6 月,他作为南京科学技术界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科学会议筹备会。9 月初,他在《南京科协》上发表了“自然科学往哪里去?”一文,主张科学的社会功能应转向人民。9 月下旬,他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体会议(他是全国政协委员)。10 月 1 日,他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观礼。

1950 年初,尹赞勋和李春昱等到北京参加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地质矿产工作会议,制定了当年地质调查计划,组织全国近百位地质专家调查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服务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迫切需要。当年 9 月中国地质工作计

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为主任,尹赞勋为第一副主任,谢家荣为副主任,他们共同擘画了新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蓝图,首先是筹建“一局两所”(矿产地地质勘探局和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后两者属中国科学院)。11 月初,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地指委第一届工作会议。

1951 年,尹赞勋参加九三学社(后当选为该学社中央常务委员)。1952 年 4 月他担任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1954 年他当选为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1955 年 6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当选为学部委员、生物地学部副主任(1957 年至 1981 年,他任地学部主任)。1955 年 10 月至 1956 年 7 月,他参与制定了《1956~1967 年(十二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的地学部分。他主持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区域地层表草案》于 1956 年获中国科学院首届自然科学奖,当年 8 月,他去山西太原调查了晚古生代含煤地层。10 月,他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波兰。1957 年,他主持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最后王竹泉、冯景兰、傅承义 3 人当选)。当年夏,他参加中国科学院祁连山综合地质考察而去到甘肃,结果,建立了祁连山区域志留系的分层系统。1958~1959 年,他主要抓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的筹备与召开,事前组织了全国各地相关的区域地层与矿产地层的现场会议,准备了大量第一手材料,1959 年 11 月 14—21 日大会在北京

召开,600多人出席,尹赞勋向大会作了“中国地层工作的成就和地层学的发展”的报告,他主持起草的《中国地层规范(草案)》及地层规范(草案)说明书》经大会修改并通过(1960年经国家科委批准试行)。会上成立了全国地层委员会,李四光为主任,武衡、尹赞勋等为副主任。尹并兼志留系专业组组长。后来,他还为这次盛会出版了《中国区域地层表(草案)补编》(1958)和《中国地层名词汇编》(1959)。1959年,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出版了《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系列丛书,他组织地学家撰写了有关地学方面的7册(主要是《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地质学》、《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古生物学》等)。

1960年,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时期,尹赞勋参与并主持制定了“中国地学发展的三年提纲和八年设想”。1961年,他筹备并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喀斯

特研究会议”。1962年,他参与并主持制定了《1963~1972年地学发展规划》。同年,在北京出席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二届理事长。1963年秋,他率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石炭纪地层地质会议。从那以后,他主要抓《中国地层典》的编纂。1965年首先出版了其中的第7册(石炭系)。他于1964年4月,与构造地质会议筹委会主任黄汲清共同主持启动了“中国地壳运动名称整理小组”的工作。8月20日—31日,他出席了在北京“科技会堂”举行的“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他与周明镇、徐仁等宣读了“中国古生物学的进展”为题的论文。1965年春,他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发表了学术演讲——“志留纪之中国”。

“文革”期间,尹赞勋虽身处逆境,却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密切关注国内外学术动

向,特别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科学问题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之初,他与张守信、谢翠华合作撰写的《论褶皱幕》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1979年1月,已77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毕生的追求。4月,他出席在苏州举行的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及第十二届学术年会,又是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会,他再度当选为理事长。10月,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他代表全国地层委员会作了20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会上讨论、修改并通过了他主持编撰的《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后于1980年经国家科委批准并颁布执行)。新一届全国地层委员会产生,武衡为主任,尹赞勋、许杰、卢衍豪等为副主任。尹赞勋后来在推动中国古生物学会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及所属各二级学会、专业委员会、学科组的建立、健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83年5月他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及首届学术讨论会”,并作了题为“古生物学的二重性”之重要报告。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

尹赞勋热心从事政治活动,他曾任第一、二、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图1 尹赞勋在其八十寿辰庆典上,与参会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原地层室同志合影

前排左起:谢翠华、张日东、刘鸿允、尹赞勋、尹老夫人、崔克信、刘东生、徐道一、周昆叔。

中排左起:刘成杰、孙亦因、李更生、张守信、闻传芬、金增信、孙晓兴、胡世玲、李红生。

后排左起:高福清、潘云唐、陈孟莪、陈锦石、刘椿、尹集祥、刘瑞玲、赵芸芸、王松山、吴浩君。

注:姓名下划横线者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